

# 为何参与武装干涉？

——冷战后北欧国家对外政策转变路径分析

彭世卿

**内容提要:**国内既有研究较少讨论北欧国家“小国军事化行动”倾向的产生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行动全程都有北欧国家的参与,其中丹麦对武力的使用更有显著的偏好。这挑战了国际社会对北欧社群“和平中立”的传统认知。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小国关注度的提高,对北欧国家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社会福利的讨论。本文借助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了国际体系层面提供给北欧国家的信息范围和性质,认为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刺激了北欧国家的对外政策转向。它们将整合后的单元层次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增强或扭曲了体系刺激,造成了冷战结束后北欧国家采取整体追随美国和北约,但在具体实践中又产生分野的不同战略取向。

**关键词:** 北欧国家 对外政策 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 和平中立 武装干涉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国际政治中通常被视为“民主和平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也被视为当前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国际社会中,北欧国家不仅具有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传统,更在涉及移民、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安全议题合作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sup>①</sup>然而在冷战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军事干预行动中,北欧国家在不同阶段展现出积极介入的姿态。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至近些年对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看到北欧国家的“身影”。其中,丹麦与挪威多次参与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设立禁飞区等军事行动,在一众北约国家中独树一帜;作为中立国家的瑞典和芬兰,同样在冷战结束后加入欧盟,并与北约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且近年来逐渐在联合演习、军事训练等方面与其持续加强合作。这无疑挑战了传统斯堪的纳维亚在国际合作中有限参与的刻板印象,也展示出北欧国家

<sup>①</sup> Mihai Sebastian Chihai, “Nordic States Contribution to Peace and Security,” *Revista Română de Studii Baltice și Nordice*, Vol.8, No.2, 2016, pp.73-91.

通过军事化行动摆脱传统国际主义的倾向。<sup>①</sup>

相比于热点议题与热点地区,关于北欧国家的研究并不多见。而有关北欧的研究成果,更以北欧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分析以及福利国家的研究居多,关于北欧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其战略取向的研究向来较少。本文尝试从冷战后北欧国家在不同阶段卷入军事参与的对外政策,分析其对外战略的转变路径。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相结合,对北欧国家的战略利益以及国内决策进行考察。而冰岛是北欧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国家,无法对其军事实力进行考量,其战略利益的国际延伸也更受限制。因此,本文对北欧国家的经验事实的选择和研究仅限于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四国。

##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北欧国家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海外武装干涉行动的探讨,常常局限在诸如“威望”“声誉”以及“战略文化”等较为空泛的层面,<sup>②</sup>未能系统解释北欧国家参与武装干涉行动的外部动因及其内部演化。研究北欧国家对外关系的文献也常常将主题聚焦于和平、区域合作与福利制度研究。有学者认为:“北欧国家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将以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一北欧社会模式作为出发点,以此作为诸如和平解决争端、确保正义平等的对外政策的规范性基石。”<sup>③</sup>然而2001年12月15日丹麦政府赶在美国对其提出要求之前,主动声明要派遣作战部队以及空中力量进行武装行动;在2011年对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军事行动中,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北欧国家的积极参与及做出的重大贡献等使北欧国家“中立和平”的一贯印象受到怀疑,也需要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化的解释。

北欧国家为何在实际对外政策中偏离了文献中呈现的“亲和而中立”的形象?而在北欧四国内部又为何体现出整体追随却在具体实践中各有区别的特点:北欧四国对

<sup>①</sup> 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5, No.2, 2017, pp.217-241.

<sup>②</sup> Peter Viggo Jakobsen, Jens Ringsmose and Håkon Lunde Saxi, “Bandwagoning for Prestige: Denmark, Norway and the War on Terro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CEEISA - ISA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jubljana, Slovenia, June 22-25, 2016; 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pp.217-241; Fredrik Doerer, “Finland, Sweden and 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35, No.4, 2016, pp.284-297.

<sup>③</sup> Anders Wivel, “Birds of a Feather Flying apart? Explaining Nordic Dissonance in the (post-)unipolar World,” in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eds., *Northern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Nordic-Baltic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 Post-unipolar World*, Routledge Press, 2014, p.85.

美国和北约整体的追随,其中丹麦与挪威甘做“马前卒”,积极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各类军事行动进行武装干涉,并做出“超出其实力”的贡献;<sup>①</sup>而瑞典和芬兰则在加入欧盟之后,力求与美国和北约发展良好关系,似乎成为非正式盟友(Informal alliance),但仍然拒绝加入北约,对美国 and 北约领导的武装干涉活动的参与度有限,并以战后重建与维和任务为主。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由预测学转向解释学,由因果律转换为建构律,<sup>②</sup>借由“主体间身份互构”的建构律有助于对北欧国家的国家利益进行合理分析。但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建构主义无法做出全部和令人信服的解释。<sup>③</sup>如果说北欧国家是因循道德维度进行对外活动,那么参与美国主导、针对“失败国家”和“非人道主义政权”的打击就可以帮助北欧国家和美国进行主体间身份互构,从而确保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进一步巩固自己支持“自由世界”的国家形象。由此来看,这的确可运用建构律进行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从而形成一个正向螺旋:在主体间不断塑造共有观念、正向互构身份的情况下,观念与规范将使得国际社会不断呈现良性发展,但矛盾也因此显现。因为建构律无法在北欧问题上自圆其说,即无法解释一个试图维护和平自由世界的非体系大国,如丹麦,为何将军事力量作为应对外部威胁必要且有效的工具?丹麦认为使用武力时,只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便不需要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甚至将参加国际军事活动视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核心,且只需积极参与北约的活动而不用获得联合国的授权。<sup>④</sup>巴尔金认为,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在案例选取以及议题设置的过程中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诸如人权规范、社会化作用甚至“去政治化”等偏好。这种带有理想与自由色彩的命题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从自助的霍布斯世界转化为他助的康德世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世界也可以从康德文化退化为霍布斯文化。而案例选取的偏向性也进一步放大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本就具有的不确定性。

北欧国家不属于米尔斯海默界定的大国,它们遵循美国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没有挑战现有大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小国不存在对体系大国的非理性挑战和修正

<sup>①</sup> Kristian Soby Kristensen and Kristian Knus Larsen, “Denmark’s Fight Against Irrelevance, or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Punching Above Your Weight’,”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ANU Press, 2017, pp.59–76.

<sup>②</sup> 参见姜鹏、李书剑:《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47–67页。

<sup>③</sup>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3, 2003, pp.325–342; 董青岭:《建构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吗?》,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79–99页。

<sup>④</sup> 关于丹麦相较于其他北欧国家更激进的军事活动战略的讨论参见 Anders Wivel, “Birds of a Feather Flying apart? Explaining Nordic Dissonance in the (post-)unipolar World,” in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eds., *Northern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Nordic-Baltic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 Post-unipolar World*, p.86.

主义动机。因此,一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分析,不能仅着眼于简单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排名,或对于物质实力、面临威胁的机械制衡的考量,而应观察它是否在国际体系的刺激下,<sup>①</sup>经过单元层次中介变量的内化,发生了强化、传导或扭曲体系刺激的效应。作为兼顾垂直层面和水平层面的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重视“还原主义”分析,打开了国家这一“黑箱”,使其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战略选择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一个活跃的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吸引了全球一批学者展开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经验研究成果,也发展为一种获得广泛认可和普遍运用的研究路径。<sup>②</sup>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1998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以回潮评论的方式总结了托马斯·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兰戴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的成果,以及迈克尔·布朗(Michael E. Brown)等人编辑的著作,创造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或曰第四个学派),并将其视为一个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中层理论。<sup>③</sup>2015年,由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杰弗里·托利弗(Jeffery W. Taliaferro)和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 Lobell)共同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研究纲领,提供比传统的替代性理论更强的解释力,<sup>④</sup>并将其从只解释结构现实主义例外案例的第一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专注于解释国家对外政策变化的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上升为可以解释、预测由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中长期对外政策、战略选择以及最终的国际结果的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重塑为与结构现实主义在功能上并驾齐驱的宏理论(Grand Theory)。

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重新整理了其研究范式以及研究变量。该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仍然共享本体论观点,例如,其理论起点仍然是指涉国家间体系的国际体系(尽管与华尔兹有关国际体系的表述有所不同),承认体系结构并扩展系统性因素至更广泛的结构调节因素,采纳“实力要素权力路径”,使用相对实力分布和“极”的

<sup>①</sup> 本文所采用的国际体系概念,来源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定义:“一组单元或要素相互关联,改变某些要素或相互关系,进而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并且整个体系展现出的特征和行为不同于受影响的那些部分,我们称这样的构成为体系”,是一种国家间体系。

<sup>②</sup> 陈志瑞、刘丰:《国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1-128页。

<sup>③</sup>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1998, pp. 144-172.

<sup>④</sup>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概念,并且同样使用一系列衡量国家物质实力的标准或指标。在变量的重构上,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细化了作为第一推动力的体系层面的变量设置,将国际体系呈现给国家的信号和信息作为核心体系层次变量,并总结为体系提供给国家的信息范围(清晰度)和信息内容(约束性/包容性战略环境),将这二者作为国际体系层面的两个关键变量。<sup>①</sup>这一代理理论家同时扩展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主要体现在对因变量的选择与扩展上。在新的因变量研究中,该理论摒弃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二分法,将因变量按照时间范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进行分类并将之与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中期对外政策/战略以及长期最终的国际结果相对应,使得采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并最终可能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化成为可能。此外,它在重塑单元层次变量的同时,回应了长期以来对前两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由于缺乏现实主义内核而频繁加入单元层次的特设变量,以及为了增加解释力而牺牲理论的简约性。因此,在试图对之前繁杂且机械的特设变量的整合问题上,第三类理论动态处理了单元层次变量,将之统合整理为:领导人意向、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这些变量反映了主要行为体面临的多种约束、政策制定者和整个社会的互动,以及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凡此种种都会影响国家回应外部刺激的方式。<sup>②</sup>最后,为了体现新一代理论的动态特征,第三类理论阐述了中介变量在进行传导、强化和扭曲体系刺激的同时,还在不同时机以不同的程度对自变量产生影响。

两极格局的结束,使得北欧国家在身份认同和地位认知上产生了变化。虽然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改变了北欧传统的国际主义倾向,但军事干预的参与既不是北欧国家的使命,也不是体系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受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影响,北欧国家参与美国、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展开广泛的防务合作,旨在吸引美国和北约对本地区的重新关注,促使其在本国利益相关领域进行更大的安全投入,避免再度被边缘化。诚如兰德(RAND)公司的分析师罗恩·阿斯穆斯(Ron Asmus)所言:“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似乎将该地区遗忘,使它们(北欧国家)害怕自己被隔离于新的安全结构之外,只留下一片灰色区域。”<sup>③</sup>1997年之后,在丹麦的争取下,美国终于又在波罗的海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并声称波罗的海是美国的欧洲愿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使北

<sup>①</sup>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42-5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9页。

<sup>③</sup> See Ann-Sofie Dahl, “Security in the Nordic-Baltic Region,” in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eds., *Northern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Nordic-Baltic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 Post-unipolar World*, p.69.

欧国家渐渐走出暗淡前景。<sup>①</sup>而在追随美国的实际行动中,北欧国家之间的分野,则是不同单元层次中介变量内化出的不同结果。依据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因果链条: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北欧国家战略环境的信息范围(清晰度)和性质(约束性/包容性)——作为单元层次的国内因素传导、强化或扭曲了体系刺激——对外政策转向,选择追随战略,并在具体的实践中产生分野。

从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出发,本文优先考察冷战后北欧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分析国际体系提供给北欧国家的清晰度以及战略环境的类型。而在考察单元层次的变量时,既要做到考察细致,又要防止过度证伪主义。

## 二 清晰度与战略环境的演化——整体走向追随

尽管华尔兹的概念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形成体系结构的更为全面的看法开创了新的起点,但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呈现给国家的信号和信息作为核心的体系层次变量,使之与结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sup>②</sup>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对国家产生刺激的并非体系本身,而是体系提供给国家的信息的范围与内容。其中“信息的范围”被定义为清晰度,“信息的内容”被分为约束性或包容性战略环境两类。清晰度作为国际体系呈现给国家的信息范围,包含三个组成部分:(1)威胁和机遇的可识别程度;(2)威胁和机遇的时间范围;(3)是否有最优政策选项脱颖而出。<sup>③</sup>在承认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赞同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视为国际体系固有特征的过往认知的同时,它将国际体系未能给予清晰的信息作为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该理论另一个重要的体系层面的变量是国家的战略环境。包容性和约束性战略环境不仅仅是国际体系中“极”的产物,对于国家而言,任何可能的实力分布既可能是包容性的,又可能是约束性的。<sup>④</sup>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同样运用“极”的概念来表示特定时期体系中强国或主要国家的数量,“极”是体系内主要国家间相对实力分布的一个函数,而不是大国间联合或联盟的主导模式,<sup>⑤</sup>这也就使得该理论从一开始即是

<sup>①</sup> See Dov S. Zakhe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During the Cold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3, No.2, 1998, pp.115-129.

<sup>②</sup>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42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59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47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41页。

动态的。作为一种附加解释变量,无论是包容性的还是约束性的战略环境,体系都能提供不同程度的清晰度。体系提供的信号范围和内容,与单元层面的因素结合形成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模式,这将在第三部分进行探讨。

冷战期间,北欧国家面临清晰且长期持续性威胁的约束型战略环境,国家的对外政策/战略选择以及对物质实力的使用都面临体系性障碍。两极的全面对抗使欧洲出现高压态势,在极大程度上压缩了主权国家自身战略利益的选择空间。北欧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占据着四个高紧张度地带:高北地区(High North)、格陵兰岛、厄勒海峡和瑞典与芬兰部分地区。<sup>①</sup>与本文相关的有三个地区(除格陵兰地区之外)。高北地区,即巴伦支海、挪威和瑞典北部地区,除了海上交通线的争夺,还关涉核战争等重要因素。因接近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导弹都将通过这一地区进入轨道,不远处的科拉半岛也部署了苏联的军事和核潜艇的基地,驻扎于此的北方舰队也是苏联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核心。此处众多的雷达站和通信设施也表明了该次区域对两大集团在情报和预警方面的关键作用。<sup>②</sup>厄勒海峡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区域,是扼住波罗的海进出大西洋的咽喉。冷战期间,整体上北欧国家身处两大集团战略要冲的地理位置,其中丹麦和挪威遭遇二战失败后彻底放弃中立,加入大西洋军事联盟,瑞典表面上中立却与北约秘密交换情报,芬兰在贸易和区域合作组织问题上则受到苏联的严格限制,厄勒海峡更是被列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之一。<sup>③</sup>在这种体系中,北欧国家受到的安全和经济威胁是清晰而长期持续的,可供选择的对外政策十分有限,该模式更类似于联盟理论所主张的“平衡威胁”和“追随强者”。<sup>④</sup>因为在约束型的战略环境中,回应威胁和把握机遇的时间范围较短,除了缓解威胁和利用机会之外没有过多选择,单元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变得不那么重要。<sup>⑤</sup>

在上述清晰且长期遭受威胁的约束型战略环境中,北欧国家在对外政策与国际行动上的实践是受限且相似的。北欧国家通过“北欧平衡”(Nordic Balance)将自身置于相对低烈度的对抗环境中。<sup>⑥</sup>丹麦和挪威虽然加入了北约,但与北约仅进行有限的合

① Ann-Sofie Dahl, "Security in the Nordic-Baltic Region," p.69.

② Ibid.

③ Ibid., p.70.

④ 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7页。

⑤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56、141页。

⑥ 关于“北欧平衡”的讨论参见 George Schöpflin, "NATO and the Nordic Balance," *The World Today*, Vol. 22, No.3, 1966, pp.114-122;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18, No.1, 1983, pp.43-56.

作。相较于其他与苏联接壤的国家,芬兰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sup>①</sup>在这一战略的实践中,丹麦和挪威拒绝来自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或核武器部署在其领土(格陵兰岛除外),以此表示不支持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也换来了苏联对芬兰的战略克制,如不与芬兰强制签订同盟条约且不在其领土驻军和部署核武器。这些政策在确保丹麦和挪威作为成员国获得北约军事保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在该次区域中保持自我克制,从而避免了对苏联的挑衅。冷战期间北欧国家的政治活动,也仅限于参与贸易和防御的合作框架,以及其他低政治的边缘化议题。

冷战结束,苏联集团解体,新的世界秩序带来了更大的宽容度和自由度。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高压态势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北约东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都进一步扩大了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范围。对瑞典和芬兰而言,苏联的解体使得来自东方的压力锐减,两个中立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可以进行更加灵活的调整。这种格局却给北欧国家带来同样的高清晰度信号:首先,威胁是清晰的。冷战结束后,北欧国家面临的包容型战略环境使其能够重新界定自身的利益范围以及调整外交政策实践,但冷战后迅速出现的波罗的海和高北地区权力真空使北欧国家日渐拓展的利益范围受到钳制与威胁;其次,在区域安全 and 经济合作框架上,一方面是北欧国家自身的共同体建设彻底破产,另一方面是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成效显著,以及北约全球行动的延伸,使北欧国家逐渐远离区域安全 and 经济安排,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合作对象与框架。

### (一) 冷战后的地区权力真空

波罗的海和高北地区在冷战后成为权力真空地带,这给北欧国家的安全机制和目标利益造成威胁。曾被欧洲和美国视为重要战略选择地带的北欧地区,随着苏联集团的解散,也从西方战略规划图上消失,成为被遗忘的一角。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被视为造成权力失衡的首要原因。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正在学习如何处理全球事务:一方面,巴尔干地区发生的危机吸引了美国的视线,是否要对此快速回应?以及这一危机是否会蔓延到欧洲大陆,都是美国亟须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北约扩大的问题也需要美国的密切关注。许多华约成员国和苏联加盟共和国试图敲开北约大门,是否要扩大北约,是否要调整北约的战略,需要美国做出抉择。相较之下,波罗的海似乎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更不用说挪威高度关切

---

<sup>①</sup>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18, No.1, 1983, pp.43-56.

的高北地区,也在被边缘化。在上述区域,美国即便有所关切也不会亲自干预,而是通过地区代理人来实现其目的。时任瑞典总理的卡尔·比特(Carl Bildt)参与俄罗斯军队撤出波罗的海区域的谈判就是典型例证。<sup>①</sup>对北欧国家来说,波罗的海和高北地区战略地位的迅速下降令人担忧,美国撤出该区域的倾向更令人忧心,因为北欧国家无力独自保护自身的利益。例如,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北极石油潜力的重新评估,以及在北海的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且前景黯淡,挪威开始意识到向高北地区拓展的重要性,并于2003年宣称:高北地区已成为挪威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中心。<sup>②</sup>丰富的能源储备和日渐清晰的运输潜力,让挪威意识到高北的经济价值。然而随着俄罗斯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以及在北极地区开展资源争夺,北欧国家感到恐惧不安。而高北地区在能源与运输上的优势和开发潜力的凸显,使该区域再次成为博弈的热点,也必将对北欧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产生深刻影响。

除了美国的退场倾向,北欧地区和高北地区的权力失衡也体现在北约的重组和地区大国威胁上。北约的重组加剧了北欧国家的战略脆弱感,原位于挪威奥斯陆的北欧部队总指挥部(CINCNORTH)被伦敦附近海威科姆新的西北盟军指挥部(AFNORTH-WEST)取代,<sup>③</sup>这一举措把挪威从欧洲大陆的军事安排中分离出来,使其孤立 in 北部。另外,丹麦也被划归位于荷兰的中欧盟军司令部(AFCENT),<sup>④</sup>这对北欧国家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不仅是对于将战略利益定位在大西洋地区的丹麦,而对于将目标锚定在高北地区的挪威更是如此。相比于冷战时期该地区不可或缺的地位,冷战后西方军事力量投入的锐减,给北欧国家的安全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也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此外,俄罗斯虽然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其同盟集团,但仍是实力强劲的区域大国,科拉半岛也依然是北方舰队的总部。也就是说,它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涉足波罗的海、巴伦支海甚至高北地区。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的强力干预使波罗的海三国未能在第一时间成功加入北约;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在北欧国家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军事威胁;乌克兰事件更加剧了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担忧。随着技术的进步,俄罗斯和北约国家都在高北地区以及北极寻求资源和利益的拓展,这都意味着冷战时期处于高压威慑下的波罗的海和高北地区,在冷战结束后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冷战期间各方谨慎行事带来的稳定,已被不稳定的军事力量对比和政治不

<sup>①</sup> Carl Bildt, "The Baltic Litmus Test,"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5, 1994, pp.72-85.

<sup>②</sup> 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pp.217-241.

<sup>③</sup> Ann-Sofie Dahl, "Security in the Nordic-Baltic Region," p.73.

<sup>④</sup> Ibid.

确定性取代。北欧国家曾依靠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对外战略上游刃有余,但在冷战结束后突然被迫面对不平衡的区域力量对比,促使其试图重新找回盟友或体系大国在该区域的投入,为保障其日益扩展的地缘利益,寻求新的政策与制度安排。

## (二)一体化的彻底破产带来区域合作的制度性困境

冷战结束后,北欧一体化建设的流产使北欧国家的发展陷入制度性困境,同时促使北欧国家改变对外政策,以应对体系变化带来的威胁。地区权力真空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使未能建立起区域安全与经济共同体的北欧国家,无法继续保持“不承担责任便可享受安全机制与共同市场”的福利。丹麦和挪威将目标转向大西洋以及高北地区但“腾挪”能力有限,瑞典和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伊始便陷入经济衰退。

冷战期间,北欧一体化进程因受到地缘限制而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合作,机制构建亦未能成型,长期以来北欧建立区域安全共同体的意愿更多地集中在追求自身安全和形象建构的务虚层面,既没有做出制度化的努力,也没有足够的物质实力保证。早在19世纪40年代,北欧的一些学者便发起了“浪漫主义”运动,由此诞生了追寻和分享北欧共同价值观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二战结束初期,北欧国家的政府间合作迅速发展,标志性成就是成立了北欧理事会(Nordic Council)。然而,北欧国家在冷战期间的合作仅限于追求国内政策一致以及以社会福利为主的领域,其最大成就是建立了北欧的单一劳动力市场。北欧理事会本质上也仅属于议事机构,无法提供防务和对外政策上的保障,更没有立法甚至约束的权力。同样,1948年瑞典提议建立斯堪的纳维亚国防联盟以及1968年丹麦试图组建北欧关税联盟等带有共同体以及联盟色彩的尝试都迅速宣告失败。尽管近年来以瑞典和芬兰牵头的建立安全共同体的尝试仍在继续,然而不论是北欧防御支援(Nordic Defense Support)还是北欧战斗群(Nordic Battle Group),其防务合作的实质仍然是以北约和欧盟的行动为载体,并未达到独立进行防务活动的水准。

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共同市场的成熟以及与北约的安全合作使北欧安全共同体彻底破产。苏联的解体极大地扩展了中东欧小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欧洲一体化进程得以提速,从贸易与市场的单方面联合迅速走向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的复合型实体。欧安会开启了赫尔辛基进程,其形成的完备的安全措施和预防性危机处理方式为世界带来“共同安全”的典范。这一进程集中体现了欧洲大陆的智慧:在制度建设方面,欧洲人致力于各种思想学派的交叉融合,<sup>①</sup>关注国家和跨国家行

<sup>①</sup>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页。

为体间深度合作的多样机制,超越了简单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时,将区域研究与全球变化结合,极力倡导合作与对话的命题。<sup>①</sup>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欧安会不断成熟的机制保障了对危机的长效监督,既增强了成员国预防危机的能力,又确保了行之有效的控制能力。此外,该进程在倡导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体系化的安全观念,如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素相连接,将个人权利与国际社会相连接,并形成了诸如谈判、协商、沟通等一揽子软性解决方法,为冷战后解决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通往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欧洲大陆提供的方案已在制度化、强制力以及可持续能力上全面优于北欧国家传统且单一的和平观念,这几乎剥夺了北欧国家传统的优越感,使其在国际环境的转变中不得不参与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以及搭上欧洲一体化的便车。与欧洲领域广、层次深的一体化进程相比,“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低政治的国际参与缺少形成实体的契机,同时由于冷战的结束,北欧国家的区域环境实质上全部被纳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西方阵营,其区域安全建立在欧洲的制度化与美国军事投入之上,使其无法另起炉灶。

冷战后,国际体系为北欧国家呈现的是清晰且长期的威胁,即区域性的权力真空和合作层面的制度性困境。然而这种长期的安全与发展层面的威胁并非迫切的、高强度的战争威胁,因而与冷战期间不同。确切来说,冷战后北欧国家面临的战略环境是包容型的。包容型战略环境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使用物质实力实现其利益的妨碍相对较小,一系列广泛的战略都可能是恰当的,国家回应潜在威胁和机遇的时间范围较长。<sup>②</sup>因此,体系刺激下的威胁信号为冷战后北欧国家对外政策转变提供了源动力,也提供了清晰的对外政策/战略选择:将自身完全纳入跨大西洋联盟,极力寻求声誉和地位从而获得利益保障,并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

### 三 单元中介的传导与抑制产生具体实践上的分化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批评之一,是其为了追求更强的解释力而常常采取纳入特设变量的方法,既缺乏描述的精确性,也未明确这些变量在何时会起什么

<sup>①</sup>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 264 页。

<sup>②</sup>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 141 页。

作用。<sup>①</sup>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摒弃了第一类和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折中主义,将单元层次的核心中介变量整合为四种基本类型: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并将其纳入感知、决策和政策执行三种国内进程。<sup>②</sup>第三类理论还回答了不同中介变量影响自变量的时机和程度,其中领导人的认知主导短期危机时期内的决策,其他变量很少参与;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变量都涉及国内进程,在短期至中期以及中期至长期内施加的影响更大。此外,根据表1,当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结合时,二者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在不完全清晰的体系刺激下,不完美施动者的产生作用条件。在高度清晰的约束性环境中,面对迫切的抉择与高强度的威胁,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与国内利益集团无法进行充分的讨价还价,此时领导者意象与战略文化是更相关的中介变量,其余因素不太可能产生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在高清晰度的包容型环境中,除领导人意象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会更为突出,个体领导人的重要性则会随时间的增加而下降。<sup>③</sup>在此基础上,下文将分析整体走向追随的北欧国家为何在具体实践中出现分野。

表1 结合体系清晰度与战略环境性质的中介变量

		体系清晰度	
		高清晰度	低清晰度
战略环境性质	约束型环境	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	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
	包容型环境	战略文化、国内制度、国家—社会关系	不确定——四组变量都可相关

资料来源:[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91页。

从北欧国家参与美国和北约主导的武装干涉行动(见表2)中可以看出,挪威和丹麦的参与热情高涨,而瑞典与芬兰并未直接进行军事打击。如瑞典在2011年的利比

<sup>①</sup>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899-912;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W. Norton, 2002, p.211.

<sup>②</sup>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60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92页。

亚行动中,仅派出战机负责空中警戒。在更接近典型的维和行动与战后建设中,瑞典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芬兰则更愿进行经济援助。从北欧国家参与武装行动的经验事实来看,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丹麦和挪威的武装干涉逐渐脱离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军事打击力度也远超普通维和手段的正常需求,且对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行动有着显著的偏好。

表 2 北欧国家在武装干涉行动中的直接参与

	科索沃 1999 年	阿富汗 2001-2011 年	伊朗 2003 年	利比亚 2011 年	叙利亚—伊朗 2011 年-
丹麦	√	√	√	√	√
挪威	√	√	-	√	√
瑞典	-	-	-	-	-
芬兰	-	-	-	-	-

资料来源: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pp.217-241。

表 3 北欧国家在武装干涉行动中参与战后维和与援建

	科索沃		阿富汗		伊朗		利比亚	
	军事	非军事	军事	非军事	军事	非军事	军事	非军事
丹麦	√	√	√	√	√	√	√	√
挪威	√	√	√	√	√	√	√	√
瑞典	√	√	√	√	-	-	√	√
芬兰	√	√	-	√	-	-	-	-

资料来源: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pp.217-241。

北欧国家的对外政策转向,取决于国际体系提供的清晰且长期的信息,并且在包容型的战略环境中国家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对外部威胁,这种定性关系到如何考察单元因素。因不存在约束型的急迫威胁,在考察北欧国家国内因素时应综合考量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所整合的四类中介变量,而非仅限其中之一。本文认为,北欧四国

的国家—社会关系和谐,国内制度对外交政策执行者的制衡水平差异极小,然而国家的战略文化与领导人的认知意象差异明显,促使丹麦和挪威的国内因素强化了体系刺激,使其对美国追随的积极程度远超其他北约小国;而瑞典和芬兰的国内因素则对体系刺激产生了抑制作用,使其积极与美国和北约开展多种合作的同时恪守军事不结盟底线,并始终游离于北约成员之外。

### (一) 北欧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内制度

针对前两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常采用的、繁杂且缺乏关联性的特设变量以解释个别国家在特定领域内外交政策结果的这一缺陷,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试图把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国家相对于社会自主做出决定的程度、内部政治联盟动力及应用武力能力)”的研究整合,提炼为“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内制度”两大变量。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变量的设置,是为了描述国家核心制度与经济和社会集团之间的互动特征,国内制度变量的设置目的则是进一步将国家—社会关系具体化。<sup>①</sup> 北欧国家共享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以及政治规范,其社会凝聚力、政府与公民一致性均超过北约内部其他小国,甚至优于英国等传统自由主义国家,因此本文将国内制度与国家—社会关系两个变量合并分析。

“民主”与“限制权力”是北欧政治制度的传统特色,早在北欧社群的海盗时期,便保留着原始的氏族议会式的民主制度,并在13世纪出现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宪章。<sup>②</sup> 由于独特的民主传统,17世纪初农民便进入各国的等级议会,19世纪北欧三国的政权更是由农民政党执掌。因此,近代的北欧社会并未出现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军对垒,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福利制经济改革之后,不平等更是被视为一种不正义。

首先,成熟的福利体制赢得了民众和利益团体对政府的信任,使社会与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相对一致。公共福利开支虽然经过一再削减,北欧国家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仍有本质上的区别。北欧国家奉行普遍主义、高税收、高收入和反对社会分层的原则,尤其是针对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保障在全球无出其右,并在处理长期失业这一问题上特别有效。<sup>③</sup> 此外,北欧的福利体制以国家为主导,高额的税收使公共部门获得了绝大多

<sup>①</sup> 参见[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66-69页。

<sup>②</sup> 刘玉安:《论北欧模式的社会历史条件》,载《欧洲》,1993年第2期,第34-39页。

<sup>③</sup> Magnus Ryner, “The Nordic Model: Does It Exist? Can It Surv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2, No.1, 2007, pp.61-70.

数资源,同时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开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大。<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产生了有别于传统欧洲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特点:传统欧洲国家民众可能会为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的市场效应而担忧,因为这可能直接对他们的就业和福利造成冲击;然而北欧国家由于国家主导福利,尤其是将个人与家庭剥离,其福利直接以个人而非家庭为终端对象,使个人获得较大的获益与满足感。

其次,在北欧国家存在农民和工人的跨阶级联盟,也有着广泛的跨党派政治观念认同(例如各党派都把“坚持保障民众的权利,去帮助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作为执政第一要义,以及致力于维护各阶级之间的平等),并且社会民主主义党派和非社会民主主义党派都代表了广泛的社会成分,<sup>②</sup>党派之间也具有较强的政策连续性,在执政观念上并无明显的差异化趋势。这种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北欧国家的观念认同和价值分享。尽管社会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北欧各国仍然在政治、种族、文化和宗教方面保持同质。<sup>③</sup>不同于传统西欧国家的个人自由主义,北欧虽有反移民、反多元化的声音存在,但由于在历史上新教(路德宗)在北欧社会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使得宗教对政治与社会缺乏统治力,国家在政治合法性和道德上占有垄断地位。<sup>④</sup>这种特征为北欧国家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了具体和高效的方案。

最后,在政府的调配能力问题上,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军事行动能力,北欧国家同样具有较高的水准。“丹麦政府毫不犹豫地为军方提供拨款,当北约准备行动时,政府已经获得议会的支持……并且外交部长宣布部署时,媒体不会提出任何关键问题……丹麦的 F-16 战机即刻奔赴西西里岛。”<sup>⑤</sup>在国内—社会关系因素中,无论是社会与政府的一致性、国内广泛联盟的和谐,还是政府的动员能力方面,北欧国家均处于高水准,因此在对外政策选择和具体实践中,国家与社会常常能够保持一致。一致的国家—社会关系对北欧国家政策制定和实践的过程均是一种强化。对丹麦和挪威而言,

<sup>①</sup> 参见林卡:《北欧国家福利改革:政策实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的制约》,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第99-110页。

<sup>②</sup> Mikko Kuisma,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2, No.1, 2007, pp.9-26.

<sup>③</sup> Clive Archer, “The Nordic Area as a ‘Zone of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4, 1996, pp.451-467.

<sup>④</sup> Mikko Kuisma,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pp.9-26.

<sup>⑤</sup> Kristian Sjøby Kristensen and Kristian Knus Larsen, “Denmark’s Fight Against Irrelevance, or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Punching Above Your Weight’,” pp.59-76.

这种“一致关系”强化了国家对体系刺激的回应,使其不仅产生了追随的意象,在具体实践中更是凭借卓越的动员能力为盟军做出巨大贡献,其表现全面优于北约成员中的其他小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中,尽管丹麦伤亡人数达到了历史高峰,公众的支持率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40-50%的比例使丹麦和美国成为阿富汗行动中公众支持率最高的两个国家。<sup>①</sup>这种一致性反过来也强化了瑞典和芬兰与美国、北约的广泛合作,却又拒绝加入军事联盟的对外政策取向。而当瑞典和芬兰政府表示不加入北约时,民众同样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愿意加入北约的人数均低于30%。<sup>②</sup>

## (二)领导人意象和战略文化——转变与固守

领导人的意象和国家的战略文化同样是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中介变量,领导人意象左右国内的第一个进程:对即将到来的体系刺激的感知,并形成“认知过滤”;战略文化对感知体系刺激产生重要影响,并形成政治领导人、社会精英甚至公众的战略理解。<sup>③</sup>在国家—社会关系高度一致的北欧国家中,各国民众与政治精英共享战略文化。

首先,在领导人意象的研究界定中,第三类理论将“政治强人”因素列入研究范畴,然而在北欧国家的具体案例中,“政治强人”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上文提到,北欧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使限制权力和平等主义成为社群的内部规范,追求广泛的利益和谐和社会福利是北欧国家内部的规范性正义。“在这个世界中,保持一致和维护集体安全与稳定总是会压倒个体进行的冒险行为和显示天才的创造性冲动;在这里,个性发挥受到严格限制,没有政治强人发挥强力作用的土壤。”<sup>④</sup>北欧国家的战略文化通过集体期望界定战略选择,并使领导人意象和社会期望趋于相对一致,塑造着国家对体系刺激的认知和决策制定。此外,第三类理论并没有像厘清自变量和干预变量时那样给予战略文化明确的界定,而是罗列了一些必要的参考要素。为便于理解,本文将战略文化这一干预变量定义为包含施动者和载体两个层面,结合意识形态和传统规范的一种结构性集体规范。它可以制约领导人的认知,也可因政府的刻意引导或卷入

<sup>①</sup> Peter Viggo Jakobsen and Jens Ringsmose, “In Denmark, Afghanistan Is Worth Dying for: How Public Support for the Wars Maintained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Casualties and Elusive Succes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50, No.2, 2015, pp.211-227.

<sup>②</sup> See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Sweden, Finland and NATO, Security Partners and Security Producers,” in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eds., *Northern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Nordic-Baltic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 Post-unipolar World*, p.132.

<sup>③</sup> 参见[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60-66页。

<sup>④</sup> [英]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中国出版集团2010年版,序言,第2页。

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动态改变。瑞典学者弗雷德·道瑟(Fredrik Doeser)在关于北欧国家战略文化的研究中对国家战略文化的定义过于狭窄,在施动者层面他认为战略文化仅仅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相关,而在载体上,认为战略文化更多和武力相关(如军队的核心任务、使用军队的意愿和任务的组织框架等)。<sup>①</sup>第三类理论基于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的“广义战略文化”观点,认为施动者范围不再仅限于精英共识,而是进一步扩展至普通大众的根深蒂固的认知,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形成了一种限制或指导国家行为的集体期望。在载体层面上,战略文化是集体期望下聚焦形成的一种共有规范。在北欧国家层面,它包含对和平中立和人道主义干涉的高度认同、跨国的制度性民主规范、对“通过实践获得声誉”的重视,以及对武装力量的使用条件与范畴等等。本文认为,排除了政治强人的过度干预行为之后,是领导人意象和战略文化的分化促成了北欧国家“一边倒”式追随和“自我克制”式积极合作的具体实践层面的分野。

北欧国家曾拥有极为相似的战略文化,彼此之间自1815年后就未再发生过战争,一直保持着地区上消极和平和积极和平的统一。消极和平是指北欧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乱,仅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进攻丹麦,以及被卷入二战的事件。除此之外的众多事件都展现了北欧地区的非战争特点,如1905年挪威独立,1918年冰岛独立以及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争议、丹麦和挪威的东格陵兰岛争议,尽管有着较高的战争风险却仍然选择非战手段。自二战以来,北欧国家也未有攻击其他任意一方的意向。<sup>②</sup>积极和平是指北欧社会在历史上多次尝试建立统一的社群,以及按照北欧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及行为方式解决问题,达成共同的和平。北欧国家间的信任和克制不仅削弱了战争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形成了互相承认的共有价值体系,19世纪由社会精英提出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仍延续至今。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同、共享的价值体系和国家—社会的高度一致使北欧国家间被外界认为不存在战争倾向,保持中立传统并且积极践行人道主义国际行动以及跨国民主规范。

然而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外部势力作用可以塑造和重构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成立直到二战结束,北欧国家(除瑞典外)因为有限的军事能力和偏远的地理位置始终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北欧国家也试图

<sup>①</sup> See Fredrik Doeser, “Finland, Sweden and 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ulture,” pp. 284–297.

<sup>②</sup> Clive Archer, “The Nordic Area as a ‘Zone of Peace’,” pp.451–467.

保持中立。一战时,北欧三国(冰岛和芬兰并未独立)便采取了中立政策,以防止在挪威被卷入英国一方的同时瑞典加入德国一方,从而使丹麦成为双方的战场;二战时,如同挪威对英国“不言而喻”的依赖政策一样,北欧国家继续选择了中立政策。但这种依赖是不切实际的,<sup>①</sup>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为地区安全提供实质性的保护,对自由贸易的追随和温和的中立政策使超过半数的北欧国家陷入战争,丹麦与挪威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德国占领。<sup>②</sup>芬兰虽然在二战期间由于“冬日战争”倒向德国一方,<sup>③</sup>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外界的侵略,使其暂时放弃了二战爆发时的中立声明,除了试图夺回失去的领土(尽管1944年被苏联再度侵占)而协助德军进攻苏联之外,并未参与轴心国进攻其他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二战成为北欧国家对外政策立场中的一个分水岭,造成了该地区在安全理念方面的分裂。

### 1. 丹麦和挪威的转变:“一边倒”式追随

二战是造成北欧国家在集体规范上产生分化的重要事件,使丹麦和挪威彻底抛弃了中立观念,走向小国军事化行动主义。虽然冷战期间武装力量的薄弱不允许丹麦超越自我防御使用武力,<sup>④</sup>但在冷战后清晰的体系指令以及包容型战略环境中,丹麦与挪威的集体规范出现重大转变,突出表现在国际人道主义干预和国际行动的参与方面:由传统的维和行动转向进攻型国际参与,由对中立和平的固守转向追随;领导人也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过滤”。虽然国际社会对自身和美国颇多批评,然而在外交政策实践中,丹麦与挪威采取坚定的一边倒式的追随。丹麦在2008年的白皮书中表明,无法确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对丹麦的领土威胁,但政界人士意识到,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会改变丹麦安全政策的条件,<sup>⑤</sup>也不再认为将安全寄托于西欧国家是可取的。一方面因为历史上的信任并没有带来和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积极和更有价值的外交政策不但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还可以对不断扩展的利益进行有效的维护。因此,丹麦放弃了被动的冷战安全政策,于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退出(Opt-out)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SDP),由此远离欧洲一体化的防务安排,并彻底转向对美国的无条件支持,积极为美国领导的行动

<sup>①</sup> Paal Sigurd Hilde, “Nordic-Baltic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in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eds., *Northern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Nordic-Baltic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 Post-unipolar World*, p.94.

<sup>②</sup> Clive Archer, “The Nordic Area as a ‘Zone of Peace’,” pp.451-467.

<sup>③</sup> 徐隆彬:《有关苏芬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67-74页。

<sup>④</sup> Peter Viggo Jakobsen, “Denmark and UN Peacekeeping: Glorious Past, Dim Futur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3, No.5, 2016, pp.741-761.

<sup>⑤</sup> Kristian Sjøby Kristensen and Kristian Knus Larsen, “Denmark’s Fight Against Irrelevance, or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Punching Above Your Weight’,” pp.59-76.

做出贡献,成为美国“死心塌地”的盟友。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丹麦越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参与武装行动并派出16架F-16战机参与打击任务,以表示对联盟体系的支持。国防部长汉斯·海克洛普(Hans Hækkerup)通过声明来表达丹麦在全球积极追求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立场:“关于施加一定压力来解决问题有多么必要,科索沃就是一个例证……北约将不会限定任何地缘边界来限制盟友的行动”。<sup>①</sup>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反复声明:“尽自己一份力量”的重要性,强调与美国的直接接触,<sup>②</sup>并批评二战时期丹麦的小国适应化政策。此外,丹麦的中右翼(自由保守主义)和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将武装力量视为积极外交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外交政策也可标记为军事行动主义。<sup>③</sup>2011年,丹麦成为仅有的、参与利比亚武装干涉行动的八个北约成员国之一,并认为是在参与正确的国家行动。<sup>④</sup>它们在利比亚投下大量炸弹,被美国称为空中的“摇滚明星”。2016年,丹麦决定追随美国参与在叙利亚/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派出了空中和地面部队。丹麦甚至成为美国与北约的专门投弹者:2014-2015年在伊拉克投弹,2016-2017年在伊拉克/叙利亚投弹。外长佩·斯蒂格·穆勒(Per Stig Møller)在经过美国多次夸奖后坦言:“如果发生危机,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我们。”<sup>⑤</sup>

挪威同样需要依靠更多的、可信赖的安全投入来缓解自身能力不足带来的压力。丹麦的目光早已投向大西洋和参与美国的全球行动,北欧共同体也宣告破产。因此,它们只能追随美国和北约,寄希望于北大西洋同盟提供安全保障。具体的实践即选择参与其主导的国际行动来获得“可靠盟友”的地位,以及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能力与意愿来参与大国主导的行动,而不是拥有联盟身份却不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享受安全保障却不愿承担风险参加海外行动的小国在联盟中是广泛存在的。挪威承担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重建阿富汗北部的领导责任,而参与安援部队的重要意义是显示挪威对北约和美国贡献的持续性与相关性。“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小国”成为挪威在联盟中的标签,如挪威快速机动营在喀布尔(Kabul)(2003年)和阿富汗北部(2006-2008年)充当快速反应部队的角色,充分展现

---

① Kristian Sjøby Kristensen and Kristian Knus Larsen, “Denmark’s Fight Against Irrelevance, or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Punching Above Your Weight’.”

② Ibid.

③ Ibid.

④ Peter Viggo Jakobsen, Jens Ringsmose and Håkon Lunde Saxi, “Bandwagoning for Prestige: Denmark, Norway and the War on Terror,” pp.22-25.

⑤ Kristian Sjøby Kristensen and Kristian Knus Larsen, “Denmark’s Fight Against Irrelevance, or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Punching Above Your Weight’,” pp.59-76.

其在军事调动上的灵活性。布什总统在2004年的演讲中提到,挪威是美国的34个合作伙伴之一。挪威高调参与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投下的炸弹超过盟军投弹总数的8%,被誉为做出了与国家规模不成比例的贡献,其积极和高效的打击得到了美国的赞扬,被认为是北约中可以重拳出击的国家,而北约及其他一些欧洲盟国则受到了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的批评。<sup>①</sup>在利比亚的投弹任务使其再次获得了美国的青睐,挪威首相因此受邀与奥巴马会面,被认定是可靠的盟友。

## 2. 瑞典和芬兰的固守:“暧昧不清”的合作

“坚固的中立传统”是讨论瑞典和芬兰对外政策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同样将其中立传统视为两国的战略文化特征,但并不认为是其战略文化的真正内核。也就是说,对国际体系的刺激真正起到抑制作用的,并不是流于表面的中立传统,而是其集体规范的本质。瑞典的中立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不仅是精英取向和民众选择,更是作为一种坚固的传统留存下来,即便冷战时期与北约有着绝密的交往行动,对于瑞典大众来说,瑞典仍算是严格的中立国。芬兰选择中立则是基于对历史和地缘关系的考量:1918年芬兰从俄国人统治下独立,紧接着便是内战;自1939年到1945年,芬兰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芬兰化”这一词汇,就是用于描述芬兰政治家在政治和军事紧张情况下维护主权和不卷入战争的巧妙操纵。<sup>②</sup>然而,中立传统只是瑞典和芬兰的战略文化特征,其集体规范的实质是大国夹缝中游刃有余的游离手段。芬兰的中立本就诞生于地缘压力,是一种讨好苏联、与西方保持距离的最优解,是为了将自身剥离出外界压力的政策选择;瑞典的中立更被视为灵活的中立,是基于自身实力的下降以及免于欧洲大陆的战祸却不否认因时而动的可能的考量。瑞典在二战中多次施行双重标准,如在战时与德国增加贸易量而与英国恰好相反,以及同意德国借道国内铁路进攻苏联,却禁止芬兰进入其境内。因此,瑞典和芬兰的中立并不是严格基于国际法的中立,而是自我宣称的一种对外政策。换言之,二者的中立传统是一种游离于大国对抗缝隙间的政治工具,是一种可操作的政治特征,其置信空间来源于其中立文化表现出的可信度,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并非来自国际法的严格定义,更没有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瑞典和芬兰同时于1992年宣称将自己的中立政策改为军事不结盟,将其解读为:为了北欧地区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

<sup>①</sup> Thom Shanker, “Defense Secretary Warns NATO of ‘Dim’ Future,” June 10,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6/11/world/europe/11gates.html>, last accessed on 13 May 2018.

<sup>②</sup> Ann-Sofie Dahl and Pauli Järvenpää, “Sweden, Finland and NATO, Security Partners and Security Producers,” p.132.

种软安全理念实际上已将中立概念降到最低界限。加入欧盟更是与其中立身份产生冲突,瑞典和芬兰则通过弱化自身的中立身份,选择完全加入欧盟获取制度性权力来保障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并且在国际上的活动远远超出曾为自己划定的范围:1994年瑞典和芬兰加入和平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f Peace, PfP),1995年加入欧盟的同时加入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至今,瑞典和芬兰已被纳入更加复杂的安全组织,并在北约领导的多次行动中承担辅助性任务,例如提供情报、医疗和后勤服务。

出于体系刺激下地区权力真空、合作制度性困境的回应,瑞典和芬兰不得不做出积极的转变,充分利用灵活的游离手段。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曾在多种场合公开批评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斯德哥尔摩的领导人认为,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快速援助是避免其被俄罗斯占领的唯一机会。<sup>①</sup>瑞典前首相弗雷德·莱茵菲尔特指出:“与北约的伙伴关系是瑞典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中心”,<sup>②</sup>保持这种伙伴关系的方法是参与其领导的任务并做出贡献。几乎所有的瑞典政党都支持与美国和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合作,这也是战略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作用使然。根据2015年通过的瑞典2016-2020新安全战略,跨大西洋合作仍然是确保欧洲安全的关键;鉴于俄罗斯的侵略性和修正主义政策,波罗的海地区可能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舞台。<sup>③</sup>芬兰同样克服了冷战禁忌,结束了对莫斯科的依赖,并采取了与西方一体化(加入欧盟,但不加入北约)的路线。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是芬兰外交和安全政策重新定位的一部分。1992年,购买62架F-18大黄蜂战斗机事件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促成了芬兰和美国在飞行员培训、演习和飞机现代化方面的持续军事合作。此外,芬兰武装部队一直在加强与美国军队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主要是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多边区域演习框架内实行。2015年,芬兰的中右翼政府指出,美国和北约在确保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希望它们的参与能阻止俄罗斯的潜在侵略。<sup>④</sup>

但这种灵活的游离手段同样不允许瑞典和芬兰同西方联盟过分靠近,毕竟在历史上,在大国夹缝中游离而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才是保证其不被毁灭的方式。因为打破

<sup>①</sup> Justyna Gotkowska and Piotr Szymański, “Pro-American Non-alignment. Sweden and Finland Develop Closer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SW COMMENTARY*, No.205, 2016, pp.1-7.

<sup>②</sup> Fredrik Doerer, “Finland, Sweden and 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ulture,” pp.284-297.

<sup>③</sup> Justyna Gotkowska and Piotr Szymański, “Pro-American non-alignment. Sweden and Finland Develop Closer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p.1-7.

<sup>④</sup> Johan Eellend, “Friends, But Not Allies: Finland, Sweden, and NATO in the Baltic Sea,” *BALTIC BULLETIN*, June 13, 2016,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6/06/friends-not-allies-finland-sweden-nato-baltic-sea/>,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8.

游离走向彻底追随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受制于长期的“中立传统”,瑞典和芬兰的历届领导人同样不会将加入军事联盟当作自己的政治目标。但不同于芬兰的是,瑞典在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武装干涉行动上更积极,这来源于其战略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即通过广泛的道德行为来参与国际活动。<sup>①</sup>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瑞典的偏好在于证明自己强大的军事调动能力和空中支援能力,却又不参与实质性的目标打击任务。1999年至2013年期间,瑞典向科索沃提供了1000多人的驻军,并于2013年结束军事参与。除传统的维和与支援任务外,瑞典在利比亚行动中部署8架鹰狮战机和一架C-130运输机帮助实现禁飞区,这是1963年以来首次在和平行动中使用战斗机。<sup>②</sup>在游离的基础上,芬兰更看重领土防御。芬兰使用武力的意愿仅限于防御性目的,因为历史的教训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战斗会有回报。同样,在参与武装干涉行动的同时,应优先考虑政治措施而不是军事措施。芬兰总统乌尔霍·凯科宁(Urho Kekkonen)曾说:“芬兰应该是一名医生而不是法官。”<sup>③</sup>1999年以来,芬兰派出武装力量参加北约领导的各种维和行动,同时提供训练和咨询的各种服务,此外承诺长期的战后援助,并将援助的领域拓宽到司法、律政、医疗、妇幼等人权援助。在对抗“伊斯兰国”的行动中,芬兰加入非军事联盟并专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芬兰对于北约的意义,并不像丹麦和挪威那样是坚定的战斗伙伴,也不像瑞典可以提供军事支援,而是作为一种增强型伙伴,在非军事领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可见的将来,瑞典和芬兰仍然不会寻求成为正式的北约成员,尽管美国与北约曾多次发出隐晦的邀请,但加强与美国、北约的合作,却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才是瑞典和芬兰领导人心中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 四 结语

冷战后国际体系提供给北欧国家的信息范围和内容,是包容型战略环境下的地区权力真空与对外合作的制度性困境,这也给北欧国家带来了安全和未来发展上的威胁和挑战,促使北欧国家进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调整加以应对。丹麦与挪威国内的战略取

<sup>①</sup> Fredrik Doeser, “Finland, Sweden and 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ulture,” pp.284-297.

<sup>②</sup> 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pp.217-241.

<sup>③</sup> Fredrik Doeser, “Finland, Sweden and 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ulture,” pp.284-297.

向和领导人共识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强化,逐渐以小国军事化行动主义的方式进行追随;瑞典和芬兰的国内因素产生强大的抑制效果,减弱了国家对于体系刺激的回应。总体来看,参与武装干涉是北欧国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随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区域小国的关注度增加,对关注较少的或既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问题亟须重新探讨。本文运用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了为何北欧国家在冷战后积极转变对外政策,整体追随美国和北约,却又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产生分野。这也是应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问题的一个大胆尝试,因为长久以来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之一,是认为它是一种只能解释大国的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如柯庆生、施韦勒、沃尔福思和扎卡利亚的相关著作,几乎都是以美国、苏联、欧洲和东亚大国作为范例。国内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进行案例分析的既有文献也以中、美等大国为主要考察对象。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次构建通则式理论的尝试,本文也正是基于此,尝试利用该理论的新近成果进行分析。

但是,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将国际体系视为国家间的体系,没有给予日益多元的行为体更多的舞台,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国际组织是大国政治的附带现象”这一观点,<sup>①</sup>忽略了国际组织与中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缺陷使在涉及北欧国家的具体研究中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会产生研究结果的偏差。北欧国家重视且与国际组织有着广泛且深入的合作,这也是其集体规范中最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此外,在北欧的高等教育中,与国际组织相关的国际项目管理、国际组织架构与实践等,往往都是政治学等学科的必修课程。在未来的研究中,国际组织与北欧国家的相互影响,及其在北欧国家对外政策中产生的作用都需要重点关注。最后,第三类理论关于国家对外政策与战略如何最终有助于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并未进行详细的论述。在这一领域,探索不同类型的小国在国际体系演化中产生的作用也是进一步完善该理论解释效力的关键。

(作者简介:彭世卿,国际关系学院、丹麦奥尔堡大学中国与国际关系专业联合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

---

<sup>①</sup> 参见[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176页。